



往事鉤沉

最近，在研討抗戰史料時，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珍本書庫發現大量宋慶齡抗戰書信原件，共有一百八十多箱信件和手稿。

從這些信件裏我們可以觸摸到歷史、追尋出宋慶齡竭盡全力為抗日救國操勞的腳印。抗戰開始後，宋慶齡就在上海和香港及時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保盟」）和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工合」）兩大組織，向全世界正義人士、反戰組織及華僑呼籲募捐、宣傳中國的抗戰。

工合國際委員會的工作很快贏得了同情中國抗戰的各國正義人士和愛國華僑的熱情支持。很快，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等國的捐款和物資總計價值上千萬美元，而且獲得了大量的醫藥和醫療器械，許多外國技術人員亦來華無償為工合工作。

據考證，宋慶齡通過「保盟」和「工合」兩大國際組織在國外募捐約五百萬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輸送到了中共抗日根據地。這在當時是一筆巨大的數字，它極大地支持了中共的抗日戰爭。

除了替延安獲取物資資源，宋慶齡的另

一特別貢獻還在於她組織大批國際友人和媒體大造輿論並宣傳中共的抗日活動。她也介紹外國記者、醫生甚至美國代表團中有正義傾向並同情延安人士在國際上為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宣傳張目。宋慶齡在上述諸多方面對中國的抗日戰爭貢獻甚巨。比如著名的寫《西行漫記》的美國作家斯諾夫婦和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都是宋慶齡直接介紹到延安的。至於她對醫療器材和人員的引進更是數不勝數。著名的白求恩、馬海德、柯棣華醫療隊和醫生們也都是她直接引薦到晉察冀根據地的。

除此以外，宋慶齡領導的保盟和工合還努力動員一切友好的國際力量支持中國抗戰。除在香港以外，工合在東南亞、歐洲和美國都有分支而且積極發揮着作用。僅這次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存檔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工合在美國大量的工作紀錄。這個組織在美國不遺餘力地宣傳中國的抗戰並發起募捐，而且直接招募專家甚至醫生、工程師、普通工

宋慶齡抗戰信函驚現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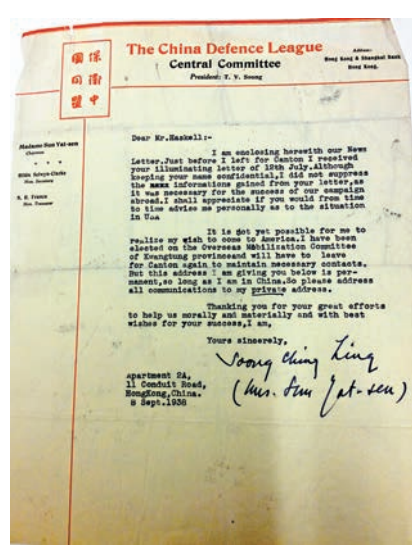
海龍

人、華僑去中國參加抗戰。它自遍布美國的宗教草根組織到大亨集團直至動員邀請到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出任工合名譽主席、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出任主席，在美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聲援贊助中國抗日活動。如果說，當年宋美齡在美國國會聲名顯赫的演說替蒋介石賺來了美元和名聲；而宋慶齡兢兢業業的努力和海量書信是以踏踏實實的工作深入人心地向美國民眾介紹中國軍民的抗戰，替我國正義的反侵略戰爭造足了輿論，贏得了掌聲。

一百多箱材料和記錄文獻浸透了宋慶齡的心血。在這裏我讀到她孜孜矻矻耗盡心神地籌劃、布置如何發動華僑、如何策動海內外政治人物和國際知名人士替中國抗戰呼籲、為傷兵、孤兒和流離失所的婦女捐獻救濟款；我也讀到了她的諄諄告誡、事無巨細的叮嚀、設計和悉心安排每一步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有親自瀏覽這些當年的書信，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樣一個真正的愛國奇女子，才能

知道為什麼新中國會如此感激這個「民主人士」和在共產黨最困苦的時候跟他們相濡以沫的人。

研究發現，哥倫比亞大學所藏這批宋慶



宋慶齡的簽字信函

作者供圖



▲宋氏姐妹的公開信

作者供圖

「回不去了」

劉荒田

無論是校友紀念畢業多少周年的聚會，一起拂去封面的灰塵，打開厚厚的相片簿；還是老夫妻牽手重遊定情之地，戰友或同事一起涉足登臨過的山川，如果有人不識時務地起個頭：「過去如何如何」，便觸動共同的痛處：回不去了！煙雲縹緲的「那一邊」，有「秋千架上春衫薄」，有「婷婷嫋嫋十三餘」，有「為賦新詩強說愁」，有「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有一張圍着柔軟細鬍茬的笨拙的嘴，試圖貼近一張水嫩的臉；連剛在離婚書上簽名的一對，想起山盟海誓，如膠似漆，也暗中哀嘆：「回不去了。」是啊，拐杖對着扁擔鏟刀，輪椅對着釘鞋沙池，病床對着書桌，藥瓶對着馬拉松跑者的水壺，一似鮮花對着胚胎，落葉對着嫩綠，稻茬對着秧苗。傷逝，是「回不去」的主旋律。

可是，我從台灣已故老詩人周夢蝶的《堅持之必要》讀到另一種「回不去了」，詩是為名詩人余光中的七十壽慶而寫的。大意是：三十年前，余光中先生大約三十八、九頂多四十一、二，在川端橋下划船時宣告：「我要堅持到六十才走」。如今早已走過來，「此一剎那之我已不同於彼一剎那」/一字吟成/九回腸斷/更無論/美之後有大/大之後有聖/聖之後有神/神之後/神之後呢/要回去是不可能了/你已走的太遠了」。這難道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慨，「好光景全在背後」的無奈？不！它是別樣的宣告：統統回不去了！「那一邊」的膚淺和愚昧；「那一邊」的仇恨和宿怨；「那一邊」一條黑巷走到底」的偏執，「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式的狂妄，「前無退路後有追兵」的惶恐，即使你工於戀舊，不怎麼厭惡不堪的往昔，視從前的失誤為「交學費」，給從前見不得人的種種貼上「成長的代價」這劃一的標籤，但也不願意再把歧路再走一遭，把傷害過的人再折磨一次。往傷口撒鹽，和賴在「往昔」不走一樣，都違反意願。畢竟我們已成熟，反思生澀年華，文革毆打老師，當知青時偷禾堂上的雞鴨，如今羞愧難當，聚焦於如何贖罪。

替「拒絕回去」設置前提，不是偏於光陰龐大無比的威力，也不是臣服於命運凌駕一切的神通，而是基於這樣的總趨勢：人是能夠長大的。就生命的總體品質、整體趨勢而言，進入晚年衰退期之前，該是：一步勝於一步，今年比去年好，明年又勝於今年。即使遇到挫折，有所倒退，但「逐漸完善」的方向不會改變。

綜上所述，有兩種「回不去」，兩者相權取其輕，後一種較為合乎生命的邏輯。具體到寫詩超過一個甲子的余光中教授，川端橋下揮槳的年華，充其量只完成了初向古典靠近的《蓮的聯想》，雖留下凄美的詠嘆：「記得/你踩過的地方/綻幾朵紅蓮/你立的地方 噴一株水仙/你立在風中，裙也翩翩，髮也翩翩」。然而，他如果「回復昔年之身」，那是太繁複的工程——須卸去後半生所寫的以百本計的著作，以千篇計的詩、散文、評論，還有覆下的千山萬水，講台下的莘莘學子，他的太太，四個因均含「珊」字而戲稱「珊瑚礁」的女兒，孫兒女——你說他願意嗎？

是啊！回不去了！殘缺的輪胎這樣說，在「吃掉」多少距離之後；遍野果實這麼說，在充滿驕傲的收穫季；參天巨木這麼說，當它俯瞰苗圃；春筍這麼說，當它對着荒原。「回不去」，原來是豐盛生命的句號。



人生在線

香港最早的中文報紙，是創刊於一八五七年十一月的《香港船頭貨價紙》，後更名為《香港中外新報》，它也是中國最早的中文報紙。不過，這份中文報紙只是西文報紙《孖刺報》的中文版。正如後來的《華字日報》（一八七二），是《德臣西報》之中文版。這兩份報紙雖由華人編輯，但不得不依附於西人。



小說香港

香港第一份由中國人創辦的報紙，是一八七四年二月由王韜參與創辦並任主筆的《迴聞日報》。《迴聞日報》強調「本局倡設迴聞日報，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務皆我華人操權，非別處新聞紙館可比。是以特延才優學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凡時務之利弊、中外之機宜，皆得縱談無所抵制。」看得出来，《迴聞日報》很強調華人對於話語權的控制，它還專門提到，由西人開設的香港華文報刊，在言論上不免局限，「然主筆之士雖系華人，而開設新聞館者仍系西士，其措詞命意難免徑庭。」《迴聞日報》首次由華人掌筆，發出中國人自己的聲音，的確意義重大。

首次提出將《迴聞日報》作為香港文學起點的，是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劉以鬯在《今天》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總第二十八期）「香港文化專輯」上發表《香港文學的起點》一文，提出香港文學的起點應在一八七四年《迴聞日報》的創刊，他的全部根據就來自於忻平的《王韜評傳》中的下面一段話：……他（王韜——引者註）又創《迴聞日報》副刊，「增幅為莊、諧兩部」。所謂「莊部」，即「新聞、經濟行情」；「諧部」即今日之副刊。王韜以他獨特的文筆，在《迴聞日報》副刊上發表不少詩詞、散文，各種文藝小說與粵語。這些文字對促進香港文壇和報界的活躍作用甚大。王韜的各類文學作品，以後也被文學史研究者收入各類書籍之中，成為近代文學史上的一份寶貴遺產。

不幸的是，這段史料出了問題，劉以鬯過於相信國內史學家了。查閱忻平《王韜評傳》原書，劉以鬯所引述的上面這段話來自於這本書的一百五十三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四月第一版）。這段話的前面被劉以鬯省略的話是「王韜身體力行，在香港創辦了《中華印務總局》，刊印出版各類中外新書。並在《迴聞日報》宣傳變法改良外，大量介紹西方新文化、新事物，以推動風氣的開化和文化



▲《香港中外新報》為香港開埠之後第一份中文報紙

資料圖片

事業的建設。」在這本書中，忻平明確說明自己並未見到《迴聞日報》，「由於年代較早，《迴聞日報》國內已無存。」「本人為此曾多次去信國內報刊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方漢奇教授求救。一九八五年方漢奇先生函稱：他已尋覓多年，然而全國各大圖書館均無見。」那麼忻平談王韜在《迴聞日報》上創立副刊的根據來自於哪兒呢？從引文看，「增幅為莊、諧兩部」等話來自於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

再查閱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我們發現忻平過於粗心大意了。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緒三十年，增加篇幅，分為莊諧二部，附以歌謠曲本，字句加圈點，閱者一目了然。」（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一九五六年第二次印刷，第二十頁。）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緒三十年」這個時間點，也就是說，戈公振所說的《迴聞日報》創立副刊的時間是在一九〇四年，忻平居然把它安到了王韜頭上。王韜在一八八四年就離開香港，一八九七年就去世了。可以說，忻平所謂王韜創辦副刊的說法，完全是一個史料錯漏。

如果以一九〇四年論的話，《迴聞日報》之有副刊就已經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早在一九〇〇年，孫中山、陳少白籌劃創立的《中國日報》就已經創立於香港，並且也設有副刊。筆者在做有關香港文學的博士論文時，曾專門去大英圖書館查閱過《迴聞日報》膠片。《迴聞日報》的版面後來逐漸固定下來，一共四版，第一版和第四版是商業行情和廣告，第二版是新聞，第三版的部分是新聞，部分是船期、電報。新聞欄目分為「京報全錄」、「羊城新聞」和「中外新聞」三個部分。王韜的文章置於新聞版面內，主要是「論說」。

劉以鬯本非學者，錯引一段資料是正常的，不過，他的觀點和文章卻流傳甚廣，影響了國內的香港文學史。國內最為權威的劉登翰的

也談香港文學的起點

趙稀方

《香港文學史》也不例外。劉登翰《香港文學史》第一章在談到《迴聞日報》的時候，也照樣引證了忻東（應該是「平」的誤植）的《王韜評傳》中的上面一段引文，然後引用劉以鬯的話，說明「香港文學的起點」應該是在一八七四年王韜與人合辦《迴聞日報》並創辦該報副刊的時候。」由於劉以鬯和劉登翰等人的權威地位，這一說法就變成了公論。

不過，王韜在《迴聞日報》上發表了大量文章，的確是事實。王韜在《迴聞日報》上發表的，主要是報章體政論文章。由於王韜身處文化前沿香港，並較早出訪歐洲日本等地，因此具有開放的眼光，他在文章中介紹了大量的西方有關於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人才諸方面的思想，並發表了自己對於中國變革的見解。從文史上看，這些報章體文章創造了一種現代政論文體，對於梁啟超等人的散文新文體變革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韜在港期間還有小說創作，他於一八七五年出版了描寫狐鬼神怪的小說集《遁窟謔言》，是他避居香港的寄懷之作。據《遁窟謔言自序二》云：「同治紀元之歲，余以避兵至粵，寄跡香海，卜居山麓，小樓一楹，僅堪容膝，榜曰：『天南遁窟』……於是，竊效干寶之《搜神》，戲學騷蘇之說鬼，燈火更闌，滯毫暝寫。」魯迅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記載評價王韜的這幾本小說：「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

王韜在香港期間還有大量的詩歌創作，這些詩歌主要收藏於一八八〇年在香港出版的《蘅華館詩錄》中，這些詩既記錄了他香港期間以及遊歷海外的種種個人經歷，又表達了他的經世變革思想，被認為是近代「詩界革命」的先聲。

由此看，王韜的確可稱為香港文學先驅。不過，王韜來香港的時間是一八六二年，離開的時間是一八八四年，在香港共呆了二十三年。《迴聞日報》創刊於一八七四年，只是王韜在港中期所創，而他在《迴聞日報》之前就大量創作，因此，如果說香港文學的起點開始於王韜，而非自《迴聞日報》始，應該更為準確。

當然，在王韜之前，香港文學仍有源流可以追溯，最早的一八五三年香港的第一份中文刊物《遐邇寶珍》。有關於此，可以參見筆者的《香港文學探源》一文（《大公報》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她們的悲劇在於靈魂並未覺醒

胡麗麗

及主人公情感的背後看到時代、社會對人們命運遭際的影響。

《聖女的救濟》是繼《嫌疑犯X的獻身》後東野圭吾伽利略系列長篇的第二部。東野圭吾在此書中複製了《嫌疑犯X的獻身》的架構，開篇依然是對案件的背景和起因進行的交代，也直接透了這部小說的謎底。男主角人真柴義孝為了生孩子而結婚，而女主角真柴綾音沒有生育能力，婚前約定的一年之期即將到來之際，義孝對綾音宣布了他的決定——離婚，而綾音亦在心裏宣布了義孝的死刑……

本書雖然在開篇便揭曉了謀殺案的起因和真凶，但東野卻有足夠的本事，令讀者知道了結局，卻猜不到過程，牽引着讀者一路跟隨警方人員的思路，左右夾攻，在層層迷宮中不斷去想像，去猜測，不忍釋卷。顯然，吸引讀者讀完小說的，是「懸疑」、是「

未解的謎題」，但能夠令人不斷回味的卻絕不僅僅是案情本身，而是小說中幾位女性人物的情感選擇。

主人公真柴綾音是最複雜的人物，其自有溫情嫺淑的一面，但其心思的縝密、對好友情感的冷漠，對丈夫一年來的隱忍，以及在與各色人等周旋時表現出的冷靜，都令人不寒而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反思這樣一個人物，如果不是陷入了一場悲劇的愛情之中，憑她的聰明、才華、幹練，分明可以在社會上獲得更高的成就，擁有美好的人生，何苦將自己作為籌碼，去賭一個本就沒有感情，只把女人當成生子工具的男人，能夠改變初衷迷途知返呢？

再說真柴義孝，這是一個有點奶油味（精心修理自己的眉毛），自信過度（堅信他可以掌控每一個人）又無情無義的男人，他曾拋棄了不知多少女子，其中有一個就是

綾音的閨密，致其服毒而死，而那毒藥也成了日後其飲下最後飲料的「調味劑」。

「虛數解」的謀殺手段，最終大白於世。但唯一不可解的是，書中的這些女子對那個無情無義，妄自尊大的男人的愛。是為了尋求一份安穩的生活嗎？顯然不是，她們都有獨立生存的能力，且冰雪聰明，才華橫溢；那麼就是為了尋求一份情感上的倚靠，尋找一個溫暖的港灣，尋求一個可以交託一世溫情的人，然而，她們遇到了一個沒有愛的能力的人。金錢、社會地位，還有佳人的深情，都彌補不了他少年時缺失的親情關愛。他就像一個巨嬰，始終都在像尋找媽媽一樣去追尋一個屬於他的孩子。

或許最終殺死真柴義孝的並不是綾音，而是從小就缺位的親情。而真正讓調子、綾音，還有宏美走上悲劇道路，也並非是感情，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女性對自我



燈下集

人真是「聰明」的動物，面對複雜的社會和說不清、道不明的人心，便直接簡化出了「是與非」、「對與錯」這樣的二選題，反正非黑即白，一錘定音，世界從此「清明」，法律便專司此職。然而這世界上偏偏要有「作家」這個物種，把簡單的二元判斷題，又還原成了複雜的社會生活圖景，第六屆本格推理小說大獎，其中花園靖子母女的遭遇、數學天才石神的出手相助，以及名偵探湯川學面對涉案老同學時的情感糾結，在書中都被刻畫得入魂入骨。除了石神令人匪夷所思的「善後」手段，層層抽絲剝繭的案情外，最吸引人的便是人心與人性，以及那些難以用對與錯言盡的情感糾結。當這些驚心動魄層層退去，讀者才會在案情以

價值認知的迷茫。表面上，她們已經掙脫了家庭的束縛，邁向了社會，擁有了獨立自主的能力，但在心理上仍然未能擺脫社會長期以來對女性的壓抑及束縛，仍將自己置於一個男性附庸的位置，未能從心理上真正獨立，她們真正的悲劇在於靈魂並未覺醒。



▲日本作家東野圭吾《聖女的救濟》，由南海出版公司於今年一月出版 作者供圖